

洋顧問與中國： 評史景遷的《改變中國》

黃默

東吳大學端木愷講座教授

改變中國

台北時報出版社，2015年

史景遷（Jonathan D. Spence）著，溫洽溢譯。

本書作者史景遷（Jonathan D. Spence），是當今知名的中國近代、現代史專家，多年在耶魯大學任教、著作等身。這本書出版於1969年，描述、分析從1620年代到1960年代，三百多年來16位外國顧問的生命歷程，在中國的表現及其影響。文筆十分優雅，看法也自有見地，是一本少見的好書。當時我在美國任教，讀過這本書，但說不到有什麼深刻的瞭解。今年中譯本在臺灣出版，譯者溫洽溢，對史景遷教授的著作頗有研究，翻譯過多本著作，譯筆又非常流暢，讀來感觸非常的多，對中國近百年的歷史也多了一層瞭解，決定把我的幾個想法提出來，與讀者分享。

史景遷教授所描述、分析的16位外國顧問，都是哪些人？是怎麼樣的人？又他們憑藉著什麼到中國來？在中國作了什麼？最後又是什麼結局？有沒有能完成他們到中國來的想法與抱負？我們一一介紹。

一、挾西方現代知識而來

史景遷描述的16位代表人物，包括：17世紀初的耶穌會傳教士湯若望（Adam Schall）與南懷仁（Ferdinand Verbiest）、19世紀的傭兵將領華爾（Ferderrick Townsend Ward）與戈登（Charles George Gordon）、20世紀中國革命時期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（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），以及50年代蘇

俄派遭到中國，協助中國發展經濟工業化的顧問 洋洋灑灑，都是一時之選。他們胸懷大志，不乏高度理想主義者，也有在本國不得志的冒險家，或是兩者兼而有之。

然而，不論身世背景如何，他們都是依恃著西方的科技作為敲門磚，到中國來實現他們的願望。他們的專長涵蓋天文學、軍事、教育、醫學、水力工程，林林總總，涉及到生活的每一個面向。湯若望與南懷仁憑藉當時西方天文曆法的知識，擊敗回教與中國傳統的曆法，深受中國朝廷的重用。出生於北愛爾蘭小鎮的赫德（Robert Hart）靠著自身的努力與對稅務的知識擔任中國的總稅務司，為清朝制定海關制度。又如上面提到的鮑羅廷，駐華短短一年多，在革命陣容中呼風喚雨，儼然是當時的革命總指揮。在他之後，美國的陳納德（Claire Lee Chennault）、史迪威（Joseph Stilwell）、魏德邁（Albert Wedemeyer）三位將軍，或是自願、或被美國政府派到中國，也是以掌握當時的軍事知識、戰略、戰術，而協助中國抵抗日本。

縱觀這 16 位代表人物當中，在中國時間最短、而無私貢獻自己生命的，當推加拿大醫生白求恩（Norman Bethune）。他在 1938 年初到中國，後來在華北日軍占領區後方的根據地，為中國共產黨軍隊治病，但不到兩年的時間便操勞過度，在 1939 年 11 月過世。

二、誰利用了誰？

史景遷所描述、分析的這 16 位外國顧問，來自不同國家，背景也不一樣，在中國擔任的工作涵蓋諸多的領域。他們與中國政府以及民間的關係是怎麼樣？又他們的結局又是怎麼樣？化約來說，這些外國顧問都受到中國政府的任用，必須與政府有密切互動關係，才能展開他們的抱負。然而，他們與中國政府的關係並不是那麼融洽的。在許多情況之下，中國政府把他們當作下屬，不許他們越權，或是威脅到主政者的地位與權勢；湯若望、南懷仁是這樣，鮑羅廷與史迪威的處境也很相似。湯若望最後牽涉到朝廷裡頭的爭權奪利，另一方面也受到教會不同教派的攻擊，落得被控圖謀不軌而治罪擬磔，「後因湯若望年邁，將凌遲之刑改判鞭撻後流放，但因湯若望素來攻勳彪炳，所以亦未執行鞭撻，後復因湯若望中風，半身不遂，不良於言，獲准軟禁在北京自宅。湯若

望於一六六六年在寓所安詳辭世，享年七十五歲。」（29頁）再說，鮑羅廷在中國不可一世，但在寧漢分裂之後也只能黯然離開武漢回俄國去了。鮑羅廷回到俄國以後，擔任過英語教師，並在一家小報擔任主編，後來為史達林清算，死於集中營。史迪威與蔣介石水火不容，相互攻擊，也是大家所熟知，我在這裡就不多說了。

再看這些外國顧問與中國社會的關係。他們大多數都盡其所能，希望融入於中國的社會。湯若望為了傳教，「過得儒者般的生活，他在漢語上頭用力極深，苦心鑽研儒家經典，換上長衫，維持體面的生活。」（21頁）他也接受中國人祭祖祀孔，視為是民俗禮儀。因此，他受到教會其他派別的攻擊，也就不難理解。另外，如華爾將軍協助清朝對抗太平軍起義，也娶了上海泰記洋行楊坊之女常梅為妻。陳納德與陳香梅的異國婚姻，更是一時美談。然而，外國顧問這些努力，看來並沒有得到中國政府，或是中國社會的認同與信任。湯若望對中國人的民族性格尤其有深刻瞭解，他說：「中國人復仇之慾極熾，一發不可收拾，哪怕會因此禍害連連，他們也會對他人的冒犯耿耿於懷，而中國人對私人恩怨的執迷不悟，導致他們會千方百計把痛苦加諸他人身上。」（30頁）話雖如此，他們個人的特質如傲慢、急躁、偏執等也必須負一部分的責任，這在以下還會提到。

三、總結為警世教訓的故事

如以個人遭遇來講，這些外國顧問大部份都失敗，鎩羽而歸，未能達成初衷。但對外國顧問這三百年來在中國的經歷，應該作怎麼樣的評價呢？史景遷的看法是，西方人以唯我獨尊之姿來到中國，憑藉先進的科技，自認大功無私為幫助中國而來。如果受到中國政府和社會的質疑，或是不接受他們的建議，他們就不知所措，或是惱羞成怒，在感情上尤多糾結。他又說，「持平而論，這些人士的故事是警世教訓，而非鼓舞人心的宣傳。……，今天的中國似乎已強大到足以讓他們確信，若西方人以顧問的身分前來中國，就必須按中國人的規矩行事，絕不坐視西方顧問夾帶別的價值觀。然而，若是就此以為中國人會輕易吸納他們看似歡迎的力量，那也同樣荒謬。如果中西雙方都對自己有了新的了解，至少還有機會不讓由來已久的誤認再度發生。」（323-325頁）

四、從洋顧問看中國的固步自封

史景遷的這個結論，言之成理，看來大多數讀者都能同意。但作為一個華人讀者，叫我最難以理解的是，近三百年來，尤其是近一百年來，中國經歷了翻天覆地的鉅變，但中國人心智的開放卻何其裹足不前。我們似乎不去，或是很少去探究這些外國顧問所憑藉的科技其背後所伴隨的價值觀——也就是科學的精神，實事求是；對個人來講，是基本的自由與權利，不受政府干預，追求各自的生活與目標，進而延伸到社會的法治觀念與民主政治。誠然，近百年來中國不少知識份子或專業人士，也一而再、再而三提出改革的訴求，強調科技、民主、自由與法治。但這些倡導都被政府壓制了下來。不論是國民黨政府，或是共產黨政府，都迷信專制極權的政治意識形態，迷信一黨專政，最後導致個人獨裁，對人民實行愚民政策，對異議人士也無情地鎮壓與迫害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近百年來的政黨與政府，才是中國積弱不振的根源。在當前，中國大陸的情況沒有多少的改變；台灣雖然邁出了一步，朝向民主法治與自由的方向邁進，但今後的發展，還有待冷靜的觀察。